



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
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
精品出版入选项目

中国音乐经济史



远古至汉代卷

韩启超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江苏省“十四五”时期重点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项目



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
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
精品出版入选项目

中国音乐经济史

远古至汉代卷

韩启超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音乐经济史·远古至汉代卷 / 韩启超著. --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23. 6
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
ISBN 978-7-5672-4403-0

I. ①中… II. ①韩… III. ①中国经济史-关系-音乐史-古代 IV. ①F129②J609.2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087795 号

书 名: 中国音乐经济史·远古至汉代卷
Zhongguo Yinyue Jingjishi · Yuangu Zhi Handai Juan

著 者: 韩启超
主 审: 秦 序
责任编辑: 孙佳颖 吴 钰
助理编辑: 陈昕言
装帧设计: 吴 钰

出 版 人: 盛惠良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社 址: 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 215006
网 址: <http://www.sudapress.com>
邮 箱: sdcbcs@suda.edu.cn
印 装: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邮购热线: 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 0512-67481020
网店地址: <https://szdxcbs.tmall.com/>(天猫旗舰店)

开 本: 718 mm × 1 000 mm 1/16 印张: 15.25 字数: 258 千
版 次: 202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4403-0
定 价: 68.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 0512-67481020



序 言

越是基础越需重视，越是艰险越要向前
——为音乐经济研究的开展鼓与呼

秦 序^①

以韩启超教授为代表的几位青年学者，敢于探索创新，编撰了《中国音乐经济史》，即将出版，嘱我写一点文字作为序文。

我当然义不容辞，因为是我鼓励他们开展这方面研究的。多年前，我所带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硕士研究生曹丽娜，受我的指定和影响，以《唐代民间营利性乐舞的生产与流通》为题，撰写了硕士论文。她顺利毕业后，通过选拔进入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任教，并且较快晋升为副教授。她的这篇文章，也很快引起了学界关注。尤其是上海音乐学院洛秦教授（现任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就曾在一次综述中国音乐史研究成果的会上，专门介绍了该文，并给予了很高评价，这也令我信心倍增。之后，我又先后指导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南京艺术学院的多位硕士、博士生，以不同时段、不同内容的中国古代音乐经济事项作为研究对象撰写学位论文，并均通过答

^① 秦序，1948年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另兼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辩顺利毕业。现在，在韩启超博士的带领和推动下，这些成果得以编写成书，并能奉献于世，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一件好事。

我相信中国古代音乐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一定会迎来新的发展和机遇。

二

回想这些青年学子尝试进行音乐经济方面的研究，从开始直到现在，在获得鼓励表扬的背后，也曾遭遇种种困难和诘难。

比如，这几位青年学子，甚至是我，原来学的都是音乐艺术和音乐学，没有接受过经济学方面的专业知识教育，非常缺少相关研究的学术“支持系统”和学识储备。这当然是一时难以逾越的巨大困难。

又如，古代音乐与经济的关系，自古以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关文献材料和实物史料不仅稀少，还零散难觅。显然，不可能在这些有限的资料上，运用现代经济学家们爱用的“总量分析法”“个量分析法”，或分析研究其中的经济“模型”和“统计方法”所积累的数据，更不可能采用黄仁宇先生所主张的“数字化管理”之类标准来考量。

再比如百年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早已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指导思想，“经济是基础”应成为一般人的常识。但翻检已有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论著，虽常提及每一时代音乐艺术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文化环境，但往往“远景”与“近景”、经济基础与音乐艺术两者各表，其皮、毛关系若即若离、似有似无，并没能深刻揭示出相互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彼此之间的密切互动，更无从展示每一时代音乐经济的多样性、丰富性和时代特色。

虽然缺少必要的、可以直接参考和依据的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研究起来自然困难重重，但是这些青年学子仍筚路蓝缕、勠力前行。

三

他们的尝试和努力，除了必须面对的主客观困难外，还有诸多因不解而引发的疑问：

你们不是学经济的，懂什么经济，研究什么经济呢？

音乐是音乐，艺术是艺术，经济是经济，怎么能扯到一起呢？



研究经济离不开数据和数学，没有数据，怎么能研究经济呢？你们拿出多少古代的、翔实可靠的音乐经济数据呢？你们懂数学（尤其高等数学）吗？

你们知道古代一场演出，成本多少钱、票价多少钱吗？

……

这些疑问，还比较容易解释回答（详后）。更难的是他们还遭遇了种种诘难和反对，甚至连使用“音乐经济”“音乐经济学”等概念，也遭到批评。比如，有人认为，因为“这一概念目前尚未形成”，可以用“音乐的产业”“音乐的商业化”，甚至可以用“音乐的经济学”，但不能采用这种“A+B”式命名的“音乐经济学”。

四

如果缺少相关文化历史知识，甚至没有经济学常识，对中国古代音乐与经济的关系不甚了解，从而提出若干疑问，甚至某些责难，都好理解。不知者，不为怪嘛。

那么，我们能不能研究音乐与经济的关系？能不能探索音乐经济学？

科学研究发展的历程表明，各种科学学科，是不断发展、不断深化的；同时，也有新的学科、新的分支学科不断涌现。另外，不同学科之间也会相互交融、渗透，从而产生种种新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诸如生物化学、音乐治疗学等）。

据网络数据，今天的学科数目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5000多个发展到了10000多个，并且还在不断增加。

音乐经济学，是音乐学与经济学两大常见学科相互结合的交叉学科，是已经在我国出现了几十年的艺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况且，科学的探索、发展，本来就没有任何禁区，也没有最后的止境。

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哲学与科学》一文中明确指出：

对于近代科学来说，“没有什么是无足轻重的”。每一个事实，甚至最微小的、最丑恶的、最遥远的、最疏离的事物，在现代科学看来都是合法的研究对象——因为它的存在。科学已变为真正普遍的。没有哪一事物

能够逃避它。没有哪一事物必须被掩藏或悄然逝去；也没有哪一事物必须保持一种神秘。^①

音乐与经济的联系，当然不是“最微小的、最丑恶的、最遥远的、最疏离的事物”。即便后面种种事物，也都有研究的必要，也都不能保持其神秘。那么，我们尝试研究中国古代音乐与经济的关系，有何不可？

因为科学研究没有任何禁区，所以去研究音乐与经济的关系，也就是开展一点音乐经济学的研究，哪怕简陋粗浅，也是可贵的尝试和探索，不足为奇。

当然，要进行任何一种科学探索，都需要一定的主客观条件，需要具备相关的基础知识，掌握一定的研究方法。但人非圣人，都非“生而知之”者，都是学而后知的人。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让好学的青年学人通过不断的努力学习，从而掌握从事某类科学研究的一定基础能力呢？

五

这里，我想大声为音乐经济学研究鼓与呼：

越是基础越需重视，越是艰险越要向前！

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是我们应该掌握的基本常识。不妨重温一下马克思的开创性论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识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②

^① 卡尔·雅斯贝尔斯. 智慧之路：哲学导论 [M]. 柯锦华，范进，译.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104-105.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恩格斯晚年也强调指出：

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①

因此，研究艺术，研究艺术史、音乐史，不能只看艺术、音乐本身，必须也看到艺术、音乐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离不开经济基础的影响，离不开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影晌。

艺术、音乐与经济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聪明的中国人早已发现，并留下许多重要记述。比如，墨子为什么提出“非乐”？

《墨子》非乐篇就认为：仁者是为天下考虑的，不是“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若“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②

墨子强调自己之所以“非乐”，是因为“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③

墨子当然知道“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的优美动听，知道各种感官的美好享受，但他反对的是统治者们为了追求这些享受，而去“亏夺民衣食之财”。

墨子还指出，音乐不能使民众得到衣食，不能解除“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之三患。他还从制器、奏乐、听乐三方面指出，音乐会成为天下之害。制造昂贵的乐器，必将“厚措敛乎万民”，“亏夺民衣食之财”。^④奏乐者、表演者，也要吃好穿好，“食必梁肉，衣必文绣，此掌不从事乎衣食之财，而掌食乎人者也”。^⑤听乐还会让人耽误工作，而追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2。

② 方勇。墨子 [M]。北京：中华书局，2015：273-274。编辑说明：书中引文均对引用文献进行原文摘录，与现代汉语用法规范不一致之处，不再进行修改批注。

③ 方勇。墨子 [M]。北京：中华书局，2015：274。

④ 方勇。墨子 [M]。北京：中华书局，2015：274-275。

⑤ 方勇。墨子 [M]。北京：中华书局，2015：278。



求浩大的音乐表演，会使“国家乱而社稷危”，“仓廩府库不实”，“叔粟不足”，“布繆不兴”，甚至亡国。^①

因此，墨子看到了经济基础对兴礼乐具有的重要作用，而过度追求乐舞的宏大壮观，费时费财，“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②，将会造成过度浪费，将会把经济基础压塌。

墨子的批评，也反映出“礼崩乐坏”的当时，各国统治者追求奢华乐舞，力求“大其钟鼓”，从而造成了大量浪费，造成经济的入不敷出。这些描述从侧面反映了当时音乐生产的繁盛，离不开经济实力的支持。经济是为上层社会进行艺术表演的重要基础。

湖北随县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了大量珍贵音乐文物，包括重达2 500多公斤的错金青铜编钟，其规模空前辉煌和宏伟。若没有发达的经济条件支持，绝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音乐艺术奇迹。

汉代太史公司马迁也独具经济学眼光，《史记》中专设“货殖列传”。《广雅》云：殖，立也。孔安国注《尚书》云：殖，生也，生资货财利。因此该列传专门记载各地物产和经商活动。文中明确记述：“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揄鸣琴，揄长袖，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③说明当时赵、郑等国，多有擅长才艺、弹琴的貌美女子。她们远嫁或不远千里提供乐舞服务，以追求富贵生活。这些乐舞人是一种当地的“出产”“土特产”，而她们的学艺和技艺推销，也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商业经济行为。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还记述，“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民俗懷急……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④土地贫瘠、人多地少的中山国，培养从小唱歌、跳舞和演奏琴瑟等乐器的歌儿舞女，他们同样是当地重要的“出产”。他们学成以后，向各国输出，为社会上层提供乐舞服务。太史公显然是从各地出产

① 方勇. 墨子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279-280.

② 方勇. 墨子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278.

③ 司马迁. 史记 [M] //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十四史” (简体字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2473.

④ 司马迁. 史记 [M] //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十四史” (简体字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2468.

和商品交易的角度，来分析记述这些文艺人才的培养和流通的。

如上所述，聪明的我国古人，早就以敏锐的经济学眼光看待艺术活动。为什么在音乐学界，很多人听到有关音乐与经济关系的话题，还会感到意外呢？

六

又如，一些学者问，没有大量数据，没有收入开支的明细数据，怎么能进行经济研究呢？

换句话说，这些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大量数据与公式，便不能研究中国古代音乐与经济的关系。

其实，只有大量数据、数学公式、各种统计表格等，才是经济学的研究，这是对经济学研究的一种误解。

史学界和经济学界，对远古时代“狩猎经济”“游牧经济”“小农经济”的判断与定性，能有多少可靠的、明晰的统计数字？这些重要判断，难道不是从经济学角度做出的吗？

古人云，“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今人说，“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虽无具体数字，但不也蕴含着非常深刻的经济学道理吗？

亚当·斯密及其时代，把经济学看成人文科学。当时的经济学研究中，数学公式和数据不多。数学公式和数据，是从19世纪末开始才在经济学研究中大量出现的，的确非常重要。

在19世纪末，经济学发生了重要的“边际革命”，边际观念的引入，使经济学得以脱胎换骨。研究边际观念，就必须运用微积分中的增量分析方法，特别是偏微分中的增量分析。而数学一旦进入经济学，也立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正因为数学对经济学的贡献很大，近代经济学也越来越离不开数学。自从1969年诺贝尔奖开始颁发经济学奖后，获奖的经济学家大多数是精通数学者，有的人本来就是数学家。^①

今天，经济学有许多不同类别，有很多不同的分支学科，比如出现了

^① 茅于軾，岑科. 人文经济学：不用数学的经济学 [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1-2.



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文字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等。有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大量采用数学和公式，但也有少用甚至不用数字和数学的经济学分支学科。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軾就曾写出《生活中的经济学》一书。此书通过讲述作者在美国这个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生活的点滴经验，说明市场经济是如何运作的。书中很少有枯燥的数据，甚至没有什么艰深的数学公式或数学模式，但它确实做到了把深奥的经济学还原为浅显易懂的事理常规这一点。该书不仅非常热销，也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①

茅于軾先生指出，19世纪末以来，经济学研究越来越数理化，逐渐形成了一种“数理经济学”，也使经济学越来越接近自然科学。经济学的这种发展，却越来越偏离了创造主流经济学的亚当·斯密及其时代把经济学看成人文科学的本义。数理经济学力主用客观的、自然科学的立场和方法去研究市场。由于自然科学中没有“是”和“非”的价值判断，只有“对”和“错”的逻辑判断，所以，清华大学的一名经济学教授樊纲公然说：“经济学不讲道德。”

他所说的“经济学”，应该就是一种自然科学式的数理经济学。^②

2013年2月，茅于軾先生与岑科合作出版了一部新的经济学专著，叫作《人文经济学——不用数学的经济学》。

茅先生说写作该书的本义，就是要使经济学回归人文科学，建立人文经济学。人文经济学主张以人的立场来研究市场，其要回答的问题是，人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价值观，人和人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自利是不是一定会害人，社会和国家应该按照什么原则建立，什么样的制度能实现全社会的福利，人如何认识自己的人生，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等等。显然，人文经济学具有超出单纯自然科学的视野，“这种研究已经跨越纯经济学，进入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交叉领域”^③。

因此，该书干脆在副标题中点明，它是一本“不用数学的经济学”！

① 茅于軾. 生活中的经济学：第二版 [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

② 茅于軾，岑科. 人文经济学：不用数学的经济学 [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3-4.

③ 茅于軾，岑科. 人文经济学：不用数学的经济学 [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5.

看来，确实有很多人需要这种“不用数学的经济学”，以便让更多的人进一步了解、学习经济学。

茅于軾先生还强调指出：

我们相信，再复杂的数理关系也能通过语言把它说明白。而且经济规律未必一定要用数学才能证明，我们的生活也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来说明经济规律。所以人文经济学也可以说是“不用数学的经济学”。^①

我们能够因为这些著述少用甚至不用数字和数学公式来谈论经济，便可以说它们不是经济学著作吗？

英国学者哈耶克撰写的《通往奴役之路》，是世界经济史、思想史上的名著，在哈耶克学术生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1974年，鉴于哈耶克在经济学界拥有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与冈纳·缪尔达尔一起，荣获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代表性著作，也没有高深数学和大量数据。

难道，能因为这部代表作少用甚至不用数学数据和表格，便否认它是经济学方面的巨著吗？

七

反对使用“音乐经济学”的学者，说“这一概念目前尚未形成”，认为只能用“音乐的产业”“音乐的商业化”“音乐的经济学”，但不能用这种以“A+B”式命名的“音乐经济学”。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其实，“艺术经济学”一词，至迟于20世纪80年代，就已在我国学界有所运用，学者们也先后发表、出版了诸多艺术经济学论文和著作，不可谓艺术经济和艺术经济学概念“尚未形成”。^②“音乐经济”和“音乐经济

^① 此段文字引自《人文经济学——不用数学的经济学》封面。

^② 我国学者李书亮等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建立艺术经济学的观点。顾兆贵从1987年便开始讲授艺术经济学课程。

学”，也只不过是“艺术经济学”的合理发展与具体延伸。

反对“音乐经济学”而主张采用“音乐的经济学”之名，后者不也是“A+B”式？大而言之，为什么音乐考古学、音乐声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美学、音乐人类学、音乐图像学，或民族音乐学、音乐上海学、音乐北京学等，均可以采用“A+B”式命名；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琴学”“书学”“诗学”“曲学”等，也都可以采用“A+B”式命名，且今天仍继续沿用，但偏偏不允许“音乐经济学”也采用“A+B”式命名呢？

如果说“音乐经济学”不能用“A+B”式命名是因为“这一概念目前尚未形成”，那么其他“A+B”式命名，包括上述种种学科名称，难道都是“概念”已经形成之后才出现的吗？它们都是形成了“A+B”式概念之后，才有“A+B”式命名的吗？

是先有事实还是先有概念？如果不允许尝试，不允许探索，甚至不允许失败、犯错误，上述大量“A+B”式命名，又从何而来？它们不都是概念“尚未形成”时，便开始有学科结合，开始有“A+B”式的探索吗？

大家知道，早在汉代文献中，就已出现了“琴道”这种“A+B”式命名。桓谭便著有《琴道》，蔡仲德先生认为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完整的琴论”^①。说到“道”，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那么，在汉代人心目之中，难道“道”能比“学”低吗？当时桓谭提出“琴道”，就运用了“A+B”式命名。如上所述，这既然是第一篇完整的琴论，也是迄今最早提出“琴道”的文章，难道也是这一概念已经形成之后，才允许它“出现”的吗？有什么材料证明这一概念早已形成？当时，又是谁来允许、批准“琴道”这一概念可以适用“A+B”式命名呢？

古代当然没有“生产力”“生产关系”等近现代学术词汇，但如果因为它们是现代词汇，后人就不能用来研究远古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吗？如果没有可以直接替代的“历史上既有的概念”，后人就不能创造、运用新的能说明问题、能包容古代内涵的学术概念吗？

固然，中国古代有“艺术”“经济”等“既有的概念”，但它们也不能严格等同于我们所运用的“艺术”“经济”等现代词汇。那么，我们今天就

^① 蔡仲德. 中国音乐美学史 [M].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5: 397.

不能运用这些现代词汇的“艺术”“经济”来描述古代的事项吗？

再广而言之，古代当然也没有地球、世界、人类、现代化等现代词汇，那我们就不能谈论古代的地球、世界和人类，以及他们的“前现代化”了吗？

八

众所周知，法国艺术史家丹纳的《艺术哲学》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具有示范意义的艺术史、美学史著作。丹纳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尼德兰的绘画、古希腊的雕塑进行了深入细致且极其精彩的分析研究。他认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他努力复活承载着、影响着上述不同时期艺术的具体文化背景与生活场景，指出每种艺术品种和流派只能在特殊的精神气候中产生，从而说明艺术家必须适应社会环境、满足社会要求。他所标榜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影响因素，在艺术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为许多学者所遵循。

但正如该书译者、翻译家傅雷先生所指出：丹纳所揭示的时代与环境，还只限于思想感情、道德宗教、政治法律、风俗人情，总之是仍属上层建筑的东西。丹纳还是忽略了或不够强调最基本的一面——经济生活。因而傅先生认为，尽管该书材料非常丰富，论证非常详尽，但仍不免有不全面之感。^①

傅雷先生的这一批评，对我们学习丹纳《艺术哲学》的成功经验，以提升对中国音乐史、艺术史的研究，是不能忽视的忠告。

我们还需要加强经济是基础的认知，而越是基础，就越需要人们的重视。我们研究作为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一的音乐艺术，怎么能脱离具有着深远影响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经济行为呢？光亮的舞台之下、舞台之后，以及环绕着音乐艺术的方方面面，无不受到经济的影响，都有一双看不见的经济大手、市场大手，在影响和支配着艺术的传播和发展。

想想当年我们刚开始尝试音乐史学的研究，杨荫浏、李纯一、黄翔鹏等前辈对我们的点滴粗浅探索，热情鼓励、勉慰有加。我们应学习继承他们科学探索的宝贵成果和成功经验，也应学习他们对青年学人的支持和激励。我们何不给关心艺术经济基础研究的青年学子们多一些帮助，多一些

^① 丹纳. 艺术哲学 [M]. 傅雷,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4-5.



掌声和支持呢？

对有志探索音乐经济研究的青年学人，我想借此机会也对你们说几句心里话。

近代科学诞生之际，为了追求客观真理，比如为揭示地球围着太阳转，有多少前辈科学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勇敢向前。意大利伟大的科学家布鲁诺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被活活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

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音乐学与经济学研究的相关知识，打好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支持系统”。我们前期的研究成果能够结集出版，要看到成绩，也一定要看到诸多不足。要认真聆听社会各界的批评指正，继续努力，不断完善自己的研究，以创造更大、更多的成绩。尤其要努力学习、继承并发扬光大前辈科学家们不畏艰险、勇敢追求真理的伟大探索精神。

今天，有人提出各种疑问，我们不必多虑计较，应将更好地解释、说明作为自己重要的义务，也将这些疑问和建议当作继续探索的动力。



目 录

序 言 / 1

第一章 远古时期的音乐经济 / 1

- 第一节 远古时期的音乐生产 / 5
- 第二节 远古时期音乐的传播、消费 / 21
- 第三节 远古时期音乐经济的总体特征 / 27

第二章 夏商周时期的音乐经济 / 32

- 第一节 夏商周时期的音乐生产 / 33
- 第二节 夏商周时期的音乐传播、消费 / 58
- 第三节 夏商周时期音乐经济的总体特征 / 70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经济 / 74

-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生产 / 76
-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传播、消费 / 118
- 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期音乐经济的总体特征 / 132

第四章 两汉时期的音乐经济 / 138

- 第一节 两汉时期的音乐生产 / 140
- 第二节 两汉时期的音乐传播、消费 / 192
- 第三节 两汉时期音乐经济的总体特征 / 217

后 记 / 223



第一章 远古时期的音乐经济

社会生产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形成，而具有典型意义的商业经济萌芽、发轫于何时，似乎已经无从可考，尤其是文字尚未诞生的远古时期。后世文献也仅仅对稍晚时期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了零星记载，如：

《尚书正义》卷第十二“洪范”载，远古三代之时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正义曰：食，教民使勤农业也。……货，教民使求资用也。”^①《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对此解释云：

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②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太史公云：

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帝喾）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虞夏之币，金为三品，

^①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 [M]. 李学勤, 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05.

^② 班固. 汉书 [M] //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十四史” (简体字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943.